

陳維新,《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(1644-1861)》  
哈爾濱:黑龍江教育出版社, 2012。427頁。

### 尤淑君\*

《清史稿》云:「邊省者,中國之門戶,外藩者,中國之藩籬。藩籬陷則門戶危,門戶危則堂室震」(卷527,列傳314屬國2,頁14648)。此語出自雲貴總督劉長佑(1818-1887)之奏疏,指出周邊藩屬與中國邊省互相倚重的關係,也說明周邊藩屬對中國邊疆防衛體系的重要性。因此,清帝國維持宗藩關係不只是為了彰顯天朝的權威,亦是保衛帝國疆土的積極手段。

清帝國國力強盛,幅員遼闊,東北、內外蒙古迤邐而至新疆,皆與俄羅斯接壤,故最早與俄羅斯往來,先後簽訂《尼布楚條約》、《布連斯奇界約》、《恰克圖條約》,謀解決清、俄兩國邊界、通商、傳教、公文往來等問題。然而清、俄兩國通商關係的建立,卻未必意味著清帝國接受了「條約體系」的《國際法》原則及其西方國際秩序,而是清、俄兩國達成了某種程度的妥協。這樣各取所需的妥協,也表現在清、俄往來的外交禮儀之上。外交禮儀是外交活動得以開展的重要形式,它未必是兩國外交的實質內容,但絕對是體現兩國外交的溫度計,不容小覷。所以,考察清代外交禮儀的嬗變,有助於瞭解清代對外交涉體制的根本性轉變,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現代性轉型的探索,也是一個新的切入點。

陳維新所撰的《清代對俄外交禮儀體制及藩屬歸屬交涉(1644-1861)》一書,即應用「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」的理論概念,探討清、俄交涉的外交禮儀

---

\* 浙江大學歷史學系講師

衝突，並以土爾扈特、哈薩克為考察對象，討論清、俄兩國爭奪藩部歸屬的過程、各自主張及其外交體制的衝突；進而分析「封貢體制」對清帝國與周邊屬國藩部間的秩序原則與其侷限性。作者陳維新，現任職於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，並在台灣藝術大學兼任助理教授，主要研究清代邊疆與外交關係問題，發表過多篇相關論文。本書由作者 2006 年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改寫而成，其中有些章節已先後在《華岡社科學報》、《故宮學術季刊》、《俄羅斯學報》等期刊發表，成果碩然。作者雖是政治學專業，但受益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任職之故，本書多使用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《大清國禮志·賓禮志》（清國史館本，文獻編號 206000219）、《皇朝禮志·賓禮志》（清國史館本，文獻編號 206000282）、《禮志·賓禮》（清史館本，文獻編號 206000243）、《藩部傳》（按：在參考文獻裡，作者將《藩部傳》誤寫為「清國史館稿本」，傳稿傳包《藩部傳》應為清史館本，文獻編號 701007983~701007990）、《軍機處檔》（按：在參考文獻裡，作者將《軍機處檔》分類為上諭檔、奏摺檔、月摺檔、廷寄檔），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或編輯的《上諭檔》、《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》、《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》、《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》等書，再加上許多翻譯出版的俄文檔案、俄人遊記、二手論著等資料，可得見作者運用史料之努力。

全書共七章，約 34 萬字。第一章為緒論，第二章至第六章為正文，第七章為結論。以時間順序為章節安排的主軸，依順治至咸豐朝為序，分別展開論述。第二章先介紹「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」理論的封貢體制、興滅繼絕觀、名分秩序論、奉正朔論等相關概念，再引用若干歷史事實證明這些理論的可應用性，並依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《史館檔·禮志》整理了清帝國與屬藩的朝貢事例、軍事聯盟、司法之主導地位。第三章先說明十六至十七世紀俄國的外交禮儀體制，再探討順治至乾隆朝的清、俄外交禮儀體制論爭，指出清、俄對外交涉體制有本質上的差異，所以雙方對外交禮儀的認知也有很大的不同，遂有許多禮儀衝突。第四章討論嘉慶至咸豐朝的清、俄關係及俄使訪華引發的禮

儀衝突，指出俄國不再滿足於以樞密院行文理藩院的交涉慣例，乃擅自派員前往北京，欲打破「封貢體制」的定例，甚至率艦入侵黑龍江；但清政府依據條約力拒俄使進京的要求，使俄國不得不另尋他法。後來，俄國利用英法聯軍之役的契機，佯藉說和，以獲實利，達成「公使駐京」的目的。第五章與第六章分別探討乾隆年間土爾扈特部、道光年間哈薩克的屬藩歸屬爭議；並比較土爾扈特部歸屬清帝國、哈薩克歸屬俄國的根本原因，指出清帝國的軍事實力才是決定土爾扈特、哈薩克歸屬的關鍵因素。第七章結論是「中華世界秩序」的軟實力，必須要有強大的硬實力充當後盾，並以地緣政治學的角度，指出哈薩克歸屬俄國後，清、俄之間再無緩衝地帶，埋下日後清帝國西疆的隱患。最後，本書主張清帝國與周邊屬國的「封貢體制」瓦解，使中華世界秩序隨即紛亂，也造成清帝國極大的存續危機。

本書的研究方法交叉使用政治學、國際關係的相關理論，與歷史研究法不盡相同，多有創新之舉，也確有見地：一是將視野拉大到整個「時代」，再以「封貢體制」概念架構，扣緊「外交禮儀」及其引發的糾紛，遂能從諸多檔案史料中，駁繁為簡，理出清、俄關係的主要脈絡，並能透過列表整理的方式，指出清政府與俄國使者各自的談判底線及其妥協辦法，對清、俄交涉過程的敘述繁而不瑣、全而不雜。二是比較東、西國際秩序的不同之處，並從獨特視角給出新解，說明俄國珍視沙皇的權威與榮譽，其特殊的外交禮儀體制與西歐其他國家不完全相似，進而分析清、俄兩國外交禮儀衝突的根本原因。三是針對過去未能注意的俄使訪華事，考論清、俄雙方衝突的分歧點，並從政治學的角度，比較清、俄雙方在禮儀方面的立場與應對辦法，頗富新意，使清、俄關係的研究不再限於軍事外交的層面。四是本書以土爾扈特、哈薩克為屬藩歸屬爭議的案例，再比對當時清帝國與俄國的國內情況，證明「封貢體制」與「興滅繼絕觀」的實踐，取決於清帝國的軍事實力。唯有清帝國的國力強盛，才能維護其「封貢體制」，也才能穩定周邊屬藩的秩序，確保清帝國能長治久安。以上是其優點。

當然本書也不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。首先，本書對研究現況缺乏相應的學術史回顧，外文資料的徵引也不豐贍，其關注的焦點集中在「封貢體制」，只能討論清、俄交涉的禮儀之爭，未能從清代賓禮體制的運作來探討清、俄關係的特殊性，也不免將複雜的清、俄交涉過於簡單化了。事實上，康熙朝晚期、雍正朝礙於準噶爾問題，刻意拉攏俄國，故清政府接待俄使時，多有變通，不全照「朝貢禮」的制禮方案辦理。〔參見拙著《賓禮到禮賓：外使覲見與晚清對外交涉體制的變化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13），頁 77-97〕但本書認為「『天朝上國』的觀念在順治、康熙朝早已根深蒂固」（頁 390），忽視康熙、雍正朝款待俄使之異，也忽略清帝國對外關係的彈性空間，誤將乾隆朝中期強調「朝貢禮」的情況當作整個清代的普遍情況，仍延續過去馬士（H. B. Morse, 1855-1934）、費正清（John King Fairbank, 1907-1991）等人「衝擊——回應」的看法，並未注意到晚清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內部變化。

其次，本書雖以清、俄關係為研究焦點，但未能直接利用俄文資料，只進行轉引或利用俄文譯著，與學界的對話較少，也多少忽略了清代官方檔案對同一史事的解釋。如第三章的清、俄兩國的禮儀衝突只引《十七世紀俄中關係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78）一書，較少站在學界前輩的研究成果上進一步開拓，像王開璽《清代外交禮儀的交涉與論爭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9）、李齊芳《中俄關係史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00）等書，對俄使訪華之事皆有嚴謹考證，其中論述亦有重疊之處，可惜本書並未進一步參考其成果，提出更具開創性的觀點或看法。又如對乾隆朝與俄國協商恰克圖通商事宜，日本學者柳澤明（Yanagisawa Akira）頗有精闢之論，也利用了許多俄文、滿文、蒙文檔案，可惜本書未能注意這些史料與成果。至於對清朝、俄國、準噶爾的三角關係若能進一步通盤考慮，對釐清清俄貿易、邊界、逃人等問題，應會有更具突破性的研究成果。

再者，若干史料引用有瑕，如第 76 頁引用《清世祖實錄》時，闕漏年份；第 56、108、130 頁有些引注只有書名、卻無頁碼；第 80、82、95、98、101、

111、125、126、127、141、147、173 頁引文出處只有篇名、卻無書名和頁碼；或俄使姓名只有今著譯名、卻未附上俄文姓名或在清代官書檔案裡的譯名，令讀者不易回查檢索。經查對作者的博士論文後，筆者發現原博士論文的史料出處皆註明引用的書名與頁碼。因此，這些疏漏為非戰之罪，可能是作者委託出版社按照大陸學界專著格式重新排版，因而不得不刪除某些引文的註腳內容，以節省篇幅，致有不盡符合學術規範之處，殊為遺憾。

總結來說，本書雖有若干缺憾，但也有不少學術貢獻，瑕不掩瑜。至於其應用「中華世界秩序原理」的研究方法，更帶領了當前國內學界在清、俄關係研究領域的成果創新，並全面性地討論了清、俄往來的禮儀之爭、外交體制及東西國際秩序的衝突，具有開創之功，為進一步開拓清、俄關係的深入研究，提供一個前瞻的方向與紮實的基礎。